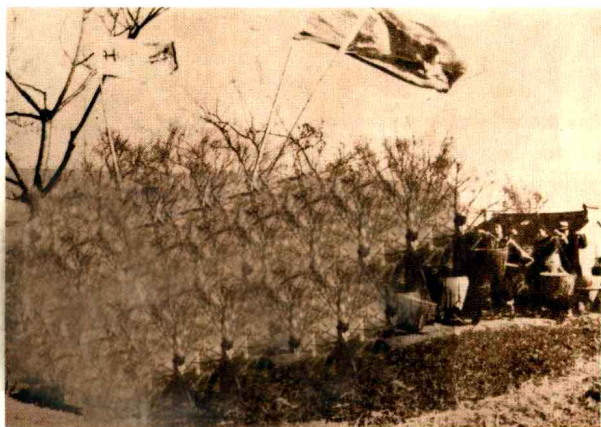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史研究 (三)


- “社会主义”的边缘人 冯筱才
同业工会的改造与国家的行业控制 王 笛
与新政权结盟的知识分子 克里斯汀·维德尔
边疆中国和1949年 刘晓原
建国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 黄金娟
中美电影中的朝鲜战争形象 毕克伟



●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对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中共为什么不打算马上占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时，明白地告诉米高扬说，早占领上海一天，就要早一天负担几百万人的粮食和燃料供应。

● 《上甘岭》和《猪排山》是一九五零年代中美各自反映朝鲜战争的早期冷战宣传的经典影片。半个世纪以后，当我们把这两部影片放在一起欣赏时，它们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

● 一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重塑了中国城乡的所有制结构与民众经济生活。但是不久便有了一个回潮，许多小商贩恢复了个体经营者身份，成了“社会主义中国”里的边缘人群。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编

中国当代史研究

(三)

韩 钢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史研究. 3 / 韩钢主编; 冯筱才等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08-1057-2

I. ①中… II. ①韩… ②冯… III. ①中国历史: 现代史—研究 IV. ①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9580号

中国当代史研究 (三)

作 者 韩钢 主编 冯筱才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4.25

字 数 42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057-2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刘 昶 许纪霖 李丹慧 李海文 李蓓蓓
杨奎松 沈志华 陈 兼 陈之宏 林蕴晖 姜 进
徐思彦 萧冬连 董志凯 韩 钢 翟 强

Elizabeth J.Perry Paul G.Pickowicz William C.Kirby

执行主编 韩 钢 徐思彦

责任编辑 刘建平

卷首语

收在本辑“专题研究”栏目的前六篇和“外稿选译”栏目的一篇，是本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于2009年6月合作召开的“新中国建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由于部分作者会后在不同学术刊物发表了人会论文，有些论文最后无法提交，我们最后只好放弃了编辑出版研讨会论文集的计划，征得尚未刊发的部分论文作者同意，在本辑中发表他们的论文。因为那次研讨会以“新中国建国史”为主题，所以与前两辑一样，本辑的内容还是着重于讨论1950年代的问题。

冯筱才的《“社会主义”的边缘人：1956年前后的小商小贩改造问题》，讨论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小商贩的改造问题。1956年，包括夫妻店、连家店、固定或流动摊贩等在内的小商贩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公私合营高潮，成了“公家人”。一方面，原有的城镇商业网络被割裂，民众生活大受影响，另一方面，许多人收入非但不见提高反而下降，经营积极性低落，家计也难以维持。诸多现实问题迫使政府不得不走回头路，从上到下说服小商贩脱离合营商店或合作社，使这个名义上仍属于“公私合营”范围的群体，实质上游离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外。作者将他们定位于“社会主义的边缘人”，揭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限度及其特质。

王笛的《同业公会的改造与国家的行业控制》以“新社会史”的视角，通过对成都市茶社业公会重组历史的考察，描绘了执政党对这个具有长期历史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改造过程。他认为，重组后的茶社业公会名义上是这个行业的代表，实际上几乎成为政府在行业的代言人，已不再具有过去一般意义上行业公会的性质，

行业公会在1950年代早期的改组中已经名存实亡。同业公会的消亡，是国家权力强化而“公”领域衰落的一个具体表现。

克里斯汀·维德尔和毕克伟的论文，不约而同把研究目光聚焦到了文化领域。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许多过去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如何解释他们在1949年做出的这一选择？克里斯汀·维德尔的《与新政权结盟的知识分子》，透过文件、档案、日记、书信和私人纪录，梳理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最初几年的态度、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处变的方式，说明他们做出的选择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寄予希望的时期、调整适应的时期，也是一个幻想破灭的时期。她还指出，最初的几年执政党也并不是占尽先手，因此，过渡时期既不应被视作“黄金时代”，亦非日后灾难的前奏。曾经与弗里曼、赛尔登写作了颇具影响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的毕克伟，这些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电影。他的《冷战宣传再研究——细读中美电影中的朝鲜战争形象》，即以两部观众极为熟悉的朝鲜战争片《上甘岭》和《猪排山》（Pork Chop Hill）为例，分析了中美冷战宣传片之间的差异。然而，在他看来，更令人深思的是双方的冷战宣传方式与对早期冷战的定义又是如何的相同。两位国外学者的选题和讨论问题的方式，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山外看山”与“山中看山”的同与异。

前两辑的论文，重心多在社会和底层。本辑发表的庞松的《“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加快“过渡”的理论支点之由来》和韩钢的《1950年代中共党务机构行政职能的强化——兼谈高层权力分工的两次变更》，则将考察的对象指向了“高层”。庞文指出，在毛泽东为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找寻具体过渡途径之时，李维汉的调查报告发现早已有之的国家资本主义确有逐步改变资本家私有制的“妙用”。李的报告与毛泽东所思高度契合，为加快过渡的理论提供了合法性解释及实证的支撑。这种找寻与契合，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中，具有关节点和催化剂的作用。韩文考察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内设机构——党务机构。文章指出，1949年执

政以后，中共对国家行政权的掌控除了通过由上而下的各级组织实施，还经过党务机构来实施，将党务机构的职能延伸到政府系统，设置了一整套与政府机构几乎一一对应的部门，直接管理政务，导致了党务机构的行政化。在逐步强化其行政职能的过程中，1950年代高层权力分工的两次变更影响颇大。两次权力变更，一方面收缩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党务机构直接干预政务的能力。这个过程表明，党务机构行政化的主要缘由不在中共外部而在内部。

刘建平关注的是1950年代执政党的基督教政策。出于现实方面的诸多考虑，中共最初对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问题并没有“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简单急躁的办法来处理”，而是在政权相对稳固后，从统战的角度出发，对其采取了既积极主动，但又不公开反对的政策。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强烈的危机感迫使中共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逐渐趋紧，朝鲜战争结束后这种趋势并未有所减缓。作者《建国前后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演变》一文对这一变化及其原因有很好的分析。

本书第一辑发表了讨论中共在贵州建政以后征粮问题的文章，这一辑我们又编发了一篇讨论粮食问题的文章：《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作者黄金娟以丰富的地方档案考察了上海解放初期的征粮问题。共产党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遇到的主要问题是，1949—1953年这一时期的征粮，直接与上海数百万人口的粮食需求严重短缺联系在一起，又因为有硬性指标，因此更易引发对立态势。相对富庶且有商品经济传统的江浙地区，土地状况与内陆、西部远为不同。新政权的干部不熟悉这一地区的特点，其对阶级的划分与当地实际严重不符，加之灾荒导致的粮食减产及征粮干部强迫命令、乱搞一气，甚至发生乱捕、乱杀的现象，一度造成新政权与上海郊区农民关系的紧张，并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刘晓原的《边疆中国和1949年》。文章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溯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中国进入急剧转型时期后，其重要内容之一是领土属性的“民族国家”化。作者以“边疆国家”的概念提出一个重新认识近现代中国

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强调 1949 年以后共和国历史中民族边疆状态的重要性，认为应在“边疆国家”历史延续性的大框架下审视现代中国的多民族政治问题。作为曾是“山中人”、如今也是在“山外看山”的旅美学人，作者的问题意识或许会给读者以启迪。

本辑发表的赵家梁的《初到国务院四办的调研》，是一位已故当事人的自述节选。赵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贾拓夫的秘书，所述对工商业改造前后的情况多有披露。《公私合营橡胶厂党支部会议记录》则是一篇史料，也反映了工商业改造后合营企业的生产、行政和政治运动的情形。这两篇都为“社会主义改造”前后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可以作为前述几篇讨论相关问题的论文的互补。

最后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虽然这三辑《中国当代史研究》重心都在 1950 年代，但我们希望不会给读者留下本系列出版物局限于此的印象。如同我们在第一辑卷首语里说明的那样，举凡 1949 年以后迄今的中国当代的历史问题，均属本出版物讨论的范围。读者将看到，我们今后将发表讨论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问题的作品；我们也衷心期待更多作者能赐予大作。

编者

2010 年 10 月

目 录

卷首语

专题研究

- “社会主义”的边缘人：1956年前后的小商小贩改造问题……冯筱才 3
同业工会的改造与国家的行业控制：
以1950—1953年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的重组为例……王 笛 46
与新政权结盟的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几个侧影（1949—1952）
……克里斯汀·维德尔 72
“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加快“过渡”的理论支点之由来……庞 松 91
边疆中国和1949年……刘晓原 117
1950年代中共党务机构行政职能的强化
——兼谈高层权力分工的两次变更……韩 钢 137
建国前后中共对基督教的政策演变……刘建平 165
建国初期新政权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1949—1953年）……黄金娟 195

外稿选译

冷战宣传再研究

- 细读中美电影中的朝鲜战争形象……毕克伟 249

回忆与口述

- 初到国务院四办的调研……赵家梁 267

史料辑录

公私合营橡胶厂党支部会议记录…………… 297

书评书介

道可道

- 试析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的理路…………… 王海光 327
- 崔奇：《我所经历的中苏大论战》…………… 邱 路 355
- 郑重：《毛泽东与文汇报》…………… 邱 路 359
- 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1949-1966）》…………… 邱 路 362
- 张锡金：《拔白旗——大跃进岁月里的知识分子》…………… 邱 路 365
- 王德威等：《一九四九以后》…………… 邱 路 369
- 袁敏：《重返 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邱 路 373

专题研究

中国当代史研究

“社会主义”的边缘人： 1956年前后的小商小贩改造问题

冯筱才*

摘要 在1955年底开始的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小商贩的改造始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些人包括夫妻店、连家店、固定或流动摊贩等，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公私合营高潮之中，其心态相当复杂，对运动的反应差异也很大。由于这些人与城乡的商业网络密切相关，其存废牵涉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当他们被并入“合营商店”或“合作社”之后，一方面，原有的城镇商业网络被割裂，民众生活大受影响。另一方面，成为“公家人”之后这些小商贩，许多人收入非但不见提高反而下降，经营积极性低落，家计也难以维持。对政府来说，尽管小商贩在公私合营对象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但随之而来造成的负面影响及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走回头路，从上到下开始说服小商贩脱离合营商店或合作社，鼓励他们以“经销”“代销”及自由商贩身份谋求生存，尽管名义上他们仍属于“公私合营”范围，但实质上这个群体便游离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之外，他们也成为当时仅有的私营经济从业者。这种相对自由的商贩阶层其实也成为1978年前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人群，而他们的命运变化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限度及其特质。

关键词 小商小贩 公私合营 社会主义 保障 管制

* 作者冯筱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前言

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称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① 如何对待私有制也就成为关键性问题之一。1949年的政权鼎革显然为中共实行“社会主义”准备了很好的前提。在毛泽东的亲自号召下，1955年底开始的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重塑了中国城乡的所有制结构与民众经济生活。按照目前的主流叙述，这无疑为中共引导全国民众步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关键一步。然而，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其本质究竟如何？

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策制订与执行及其本质，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② 如 George Konrad, Ivan Szelenvi 强调社会主义发展内在动力是国家资源的最大化再分配权力，^③ 政府为达到将国家的一切纳入计划范围内的目的，一个可能的举措，便是消灭其他任何可能拥有再分配资源能力的组织。^④ 这点也许是全能计划经济主义者的理想蓝图，例如苏联就曾大规模摧毁小生产者的自我经营活动。^⑤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里一般官员的想法与政府计划是两回事，Pavel Campeanu 发现这两者之间经常是有矛盾的：官僚系统有其应该完成的管理目标，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完成上头的指标及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中央决策者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积累

① “社会主义”一词，不仅指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在全球流行的一种主要的思想意识形态，也被指那些宣称自己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政治统治、制度和政策，以及试图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各种政党和运动。社会主义是一种互相矛盾的思想系统，马克思这一派的社会主义者更强调的是计划与中央集权，特别是生产的集中化管理。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0～761页。从中国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通常所研究的“社会主义”，其实既包括清末以降开始传播的芜杂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又包括1920年代后，中共为代表的政党主张与活动，也指1949年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与实践、运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最后这个层面的“社会主义”。

② 有关研究成果可参见 Katherine Verdery, *Theorizing Socialism: A Prologue to the “Transi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18, No.3, pp.419-439.

③ Ivan Szelenvi,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8 (1982), p318; George Konrad, Ivan Szelenvi,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Translated by Andrew Arato And Richard E.Allen, p.48.

④ Ference Feher, Agnes Heller and Gyorgy Markus,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an Analysis of Soviet Societie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3, pp.67-68.

⑤ Jan.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30-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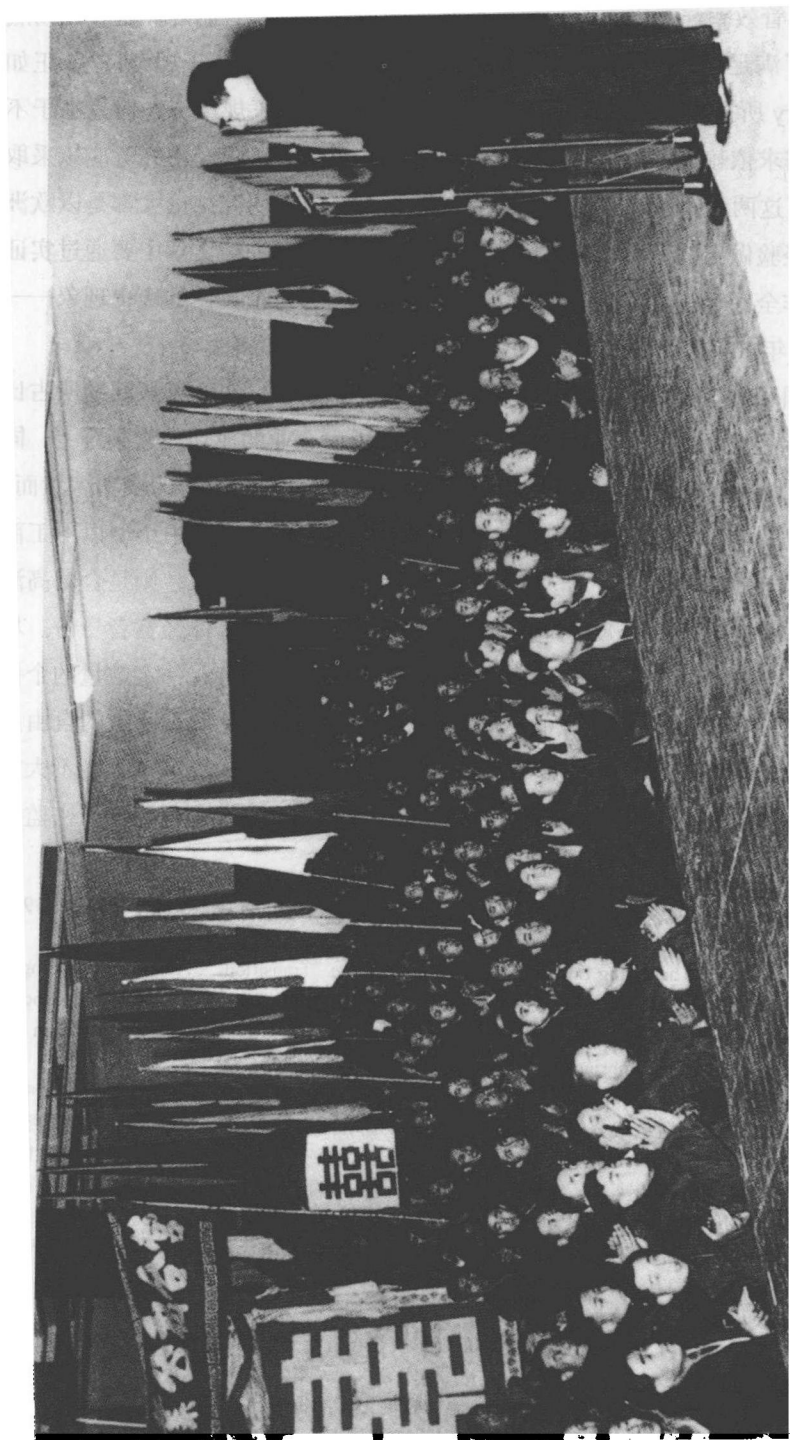
生产资料，不大管效率与产出。^①但事实往往证明过激的计划管制终究是难以彻底实现。民众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便有可能把视线转到“非正规经济”，正如 Katherine Verdery 所提到的，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想抑制非正规经济，但是由于不能解决消费者需求依赖，实际上都无法根绝。因此，对于非正规经济究竟应该采取压制还是容忍，这两者间始终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②以上研究结论大都是以欧洲与苏联的历史经验做出的，那么中国的情形究竟如何呢？在一篇文章中要通过实证性历史分析来作全面解答显然是不现实的，笔者愿意选择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1955年至1976年未曾停止的小商小贩改造问题来对此稍加讨论。

在有关中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叙述中，小商小贩问题所占比重很小。^③人们往往把叙述重心都放在大中型私营工商企业的成功“赎买”上，同时用这些大中型企业公私合营之后的经济数据来显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然而，1955年底到1956年初的公私合营高潮，卷入其中的绝大多数均是中小型以下工商业者，尤其是小商小贩与手工业者。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现象，则是合营高潮结束后不久，随即便有了一个反方向的回潮，许多商贩恢复为个体经营者身份。尽管这个过程后来又出现反复，但自始至终，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存在一定数量的个体商贩以及仅在形式上参加合作组织的“准个体商贩”，还有就是没有证照的自由商贩（或称“非法商贩”），他们后来成为“社会主义中国”里的边缘人群，既不大能够享受到类似于工人的福利保障，也不像农民那样从生产到分配全程处于严密监控

^① Pavel Campeanu, *The Genesis of the Stalinist Social Order*, Armonk, N.Y.: M.E. Sharpe, 1988, pp.143-157.

^② Katherine Verdery: *Theorizing Socialism: A Prologue to The "Transi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18, No.3, p.423; 有关“非正规经济”的讨论还可参见 Istvan R. Gabor, "Second Economy and Socialism: 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in Edgar L. Feige, eds., *The Underground Economies: Tax Evasion and Information Distor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339-360.

^③ 所谓“小商小贩”，在中共政策表述里，曾是一种阶级成分。1950年8月4日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便单列“小商和小贩”名目：“没有或只剩少量资本，向商人或小生产者购入商品，向消费者出卖，不雇请工人或店员，自己从事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劳动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小商。经常流动行走的小商，称为小贩。”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基层商业局等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1年，第3页。后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地方干部常将小商小贩与“资本家”混为一谈，故专门以“有无雇佣关系”作为主要界限。1961年6月商业部与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召开的小商小贩座谈会，规定内部掌握区分小商小贩与资本家的标准是，“凡从事商业经营没有雇用职工（不包括临时工、学徒），从事饮食、服务行业没有雇用职工或用职工一人（不包括临时工、学徒），而他们的经营资金在五百元以下的，可划为小商小贩。”不过，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沈阳、重庆、西安等八大城市，以及物价较高地区，即使符合上述雇工标准，但资金在一千元以下也可划为小商小贩。同时该标准也提到要参照本人出身成分。如从事小商小贩经营前成分是资本家，仍划为资本家。《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第189～190页。



1956年1月，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图为周恩来向北京市西城区工商界报喜队讲话。

之下。这种边缘人群的存在，既是对社会主义纯洁性的讽刺，也为1956后不断出现的“反资本主义复辟”运动提供了现实背景。笔者将通过梳理这个基本的历史过程，以考察中共在1956年后“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与限度。

在1980年代之前，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对私营工商业的存在与改造均没有太大关注。

对计划经济的关心也多集中于工业部门的管理绩效方面。^① 不过仍有学者开始研究中共建政后的农村私商所面临的处境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② 为1956年之重大变化提供一个背景性分析。其他一些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也多从宏观上探讨此次制度转型的原因与影响，没有特别关注其中的细节问题。^③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后农村市场的变化曾有清楚的论述，他发现改造后尽管只有5%的零售业务掌握在私商手中，但各类市场仍遵循着传统的运行路径。同时他也了解中共高层在此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以及“高潮”之后合营组织解体等细节。^④ 其对“农村商人社会主义化”的成效似相当肯定。^⑤ 最近一些研究涉及到中共消灭私营工商业的动因与策略。^⑥

至于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前后小商小贩的遭遇，及其与计划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尚未见人提及。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曾注意到改造完成后仍有很大数量的个体商贩及手工业者没有被纳入国营经济范围，因为这些人“越来越过

^① Dwight H. Perkins, Research on the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2, No.2 (Feb., 1983), pp.345-372.

^② Vivienne Shue, Reorganizing Rural Trade: Unified Purchase and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dern China*, Vol.2, No. 1(Jan., 1976), pp.104-134; Dorothy J. Solinger, State versus Merchant: Commerce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1, No.2(Apr., 1979), pp.168-194.

^③ Kenneth R. Walker, Collectivisation in Retrospect: The "Socialist High Tide" of Autumn 1955-Spring 1956,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6(Apr.- Jun., 1966), pp.1-43.

^④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 No. 3(May, 1965), pp.364-365.

^⑤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 No. 3(May, 1965), pp.376-377.

^⑥ 苏伟业（Bennis Wai-Yip So）不同意新民主主义的终结使得私营经济逐渐消亡的说法，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政策执行本身就已损害了私营工商业存在的空间，因此，私营工商业之末路自新民主主义一提出似乎就已经命定。Bennis Wai-yip So, The Policy-Mak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arly 1950s: Findings from New Material,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1(Sep., 2002), pp.682-703. Toby Ho 则从“风险管理”角度来重新研究中共消灭私营工商业的做法，他认为从这点来看，中共似乎取得一定的成功。Toby Ho, Managing Risk: The Suppress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n the 1950s, *Risk Management*, Vol.2, No.2(2000), pp.29-38.